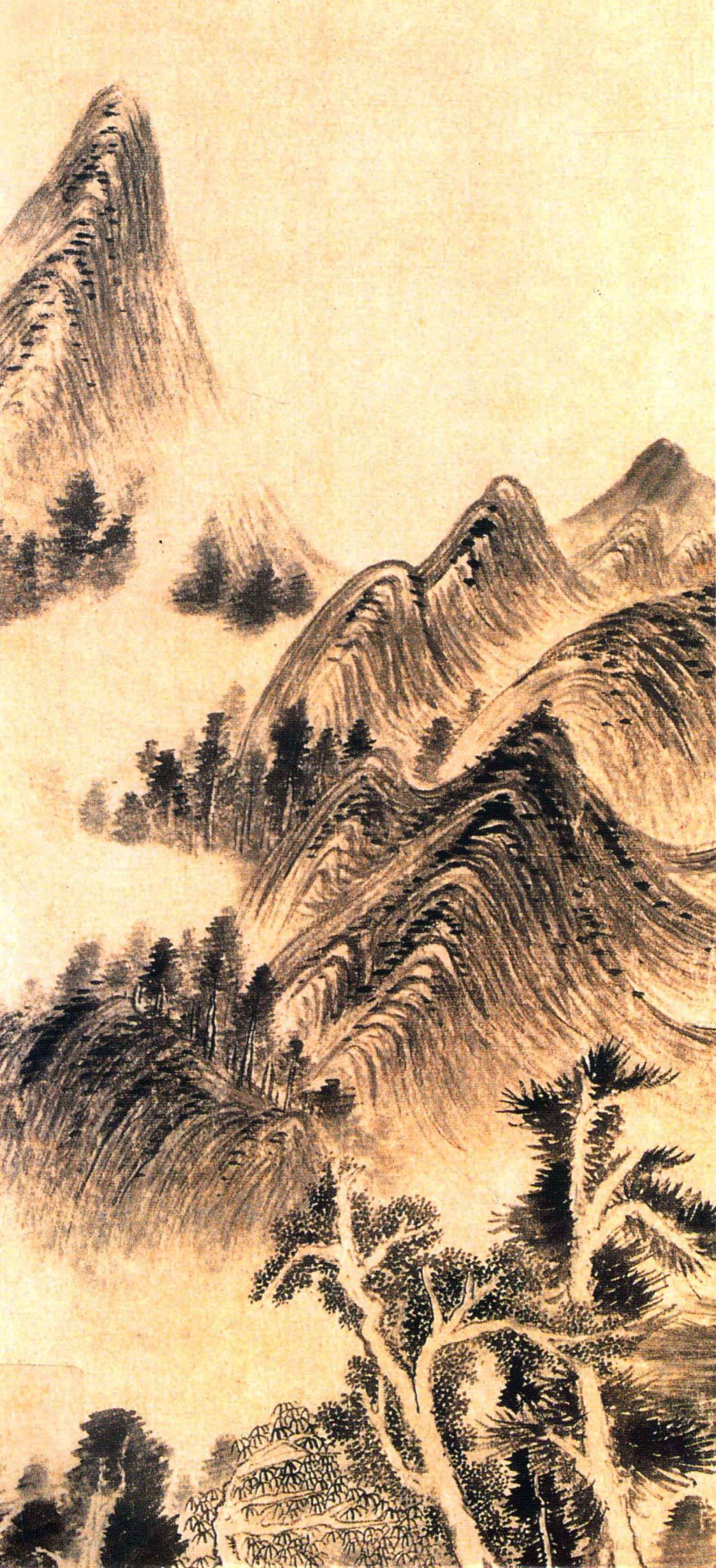




中国
绘画
大师
精品
系列

王东声

王东声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中
国
绘
画
大
师
精
品
系
列

王东声

王东声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绘画大师精品系列. 董其昌 / 王东声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80-1481-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明代 ②汉字 - 法书 - 作品集 - 中国 - 明代 ③董其昌 (1555 ~ 1636)
- 书画艺术 - 艺术评论 IV. ①J222 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2222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
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作 者: 王东声

责任编辑: 陈军 陈东

策 划: 北京艺美联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中国绘画大师精品系列——董其昌

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江美大厦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39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0-1481-2

定 价: 180元

赣版权登字-06-2012-54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言

判断董其昌，难免会陷入逻辑上左右为难的一种困局。

在画史上，董其昌“颇受争议”，赞誉他者，将其捧上神坛；贬斥他者，将其打入地狱。

关于“赞誉”，原因是鉴于在诗文、书、画及鉴赏等方面的造诣，董其昌生前身后都赢得了诸多赞誉，甚至不乏“本朝第一”、“以书法重海内”、“古今独步”、“艺林百世大宗师”等称谓。另外，他在理论上理想化地对中国绘画进行了系统归纳与总结，把“文人画”理念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于“贬斥”，有人非议董其昌为人世故圆滑，仕途上逢场作戏，尤其是在“民抄董宦”这一事件上，更是令这位享有盛名的一代书画大家的形象遭受了毁灭性影响。人们认为，即使他有再多的艺术情怀，再有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也无非将艺术作为其谋求名利的幌子，无非是烘托其政治生涯的一种手段而已。

时至20世纪，批评之音仍绵绵不绝。批评者要么将董其昌的那段玷污事件重新掰扯一通，要么言他在理论上搞形式主义，他的绘画被指责为一味拟古的代表，甚至他的作品一度在书画展览中销声匿迹。

196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治秋的文章《民抄董其昌一案略述》，作者在文中完全否定了董其昌的书画成就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将董其昌定性为“封建统治者的支柱，是大地主、大恶霸、大官僚、大军阀的代表人物”。又说：“董其昌及其三个儿子以及恶仆，在华亭为非作歹，积怨已深。”“封建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惨酷压榨，荒淫无耻到了极点。”

1977年冬，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历代名画，董其昌终于有一幅山水画参展，但随附一则标签，上面还要开列“问题清单”，痛陈他人生与艺术上的一些“罪过”。

如此，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侧目董其昌的“卑劣行径”从而鄙斥其人品乃至画品所致。

当然，也有人包容这位兼政客与艺术家双重身份的文人，认为董其昌是“为名所累”。

清人毛祥麟在《墨余录》中又表示了不同意见：“文敏居乡，既乖治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意思是：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而是董其昌大德有亏！

可以说，世俗意义上的董其昌饱受非议。

的确，无论仕途，还是艺术，董其昌的个人形态都具有游移不定甚至相互矛盾的特征。现实生活中，似乎有两个董其昌的存在，一个在京师及外省担任官职，一个在老家与山林之间。董其昌之于官位，“热切”抑或“淡泊”？于艺术，“入古”还是“见我”？

于是，关于董其昌的人格形象，基本上被赋予两种模式。其一具有政治属性，其二具有艺术属性。历来，学界也基本上顺着这两种模式对其进行描绘。

第一种模式：具有“政治属性”的董其昌。人们将他定义为一位具有强烈政治欲望的宦官形象，自私自利，品德齷齪，劣迹斑斑。

第二种模式：具有“艺术属性”的董其昌。将其描绘成一位“淡薄于政治”的文艺家形象，政治只是他得以托身的“借口”。

但是，董其昌果真就是这样一个处世行事犹豫不决甚至两面三刀的人吗？难道，在那个充斥着政治阴谋的晚

明时代，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不说辉煌也足以显赫的政治地位，都是因为善用书画手段来沟通维护而获得官运亨通的吗？难道，在他 82 岁的人生历程中，除去大部分在家闲居，在其从政至少 15 年之久的时间里，他只是例行公事，在政治上毫无理想与抱负、毫无作为吗？

假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同样疑问重重。

对于一位兼政客与艺术家于一身，能够在艺术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能够在画学领域卓有建树并被称之为“一代宗师”的人，在政治上却鼠目寸光？

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

循着这样的疑问，假若将董其昌的政治生涯与艺术活动加以统一考察的话，或许事实并非如此，或许能够侦查出一些引人识见的因果律。

一、董其昌的内在格局分析

《明史·文苑传四·董其昌》曾记载：“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这至少表明，董其昌在多个领域还是做过很多公务的。

《容台文集·卷六》中的“笔断”篇，似乎就是董其昌的从政日记，他从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类公文事务分别加以分析，不但记录政事，还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方案，大胆发表参政建议，袒露心得。

1614 年（万历四十二年），他在《笔断》中还对“私铸公行钱法”事件表明见解，并记有“苏轼有言，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君子，而败于寒陋之小人”（《容台文集》卷之六“户部类”）这样的话，显然对“国家大事”也是一腔热血。

董其昌在《笔断》中，立场分明，褒贬有致。他之所以写作这些警醒人心、改革时弊的按语，一定是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期待。刘之诚《序》中亦有这样的评价：“加以笔断尤为剀切，冀有以革奸弊，而振纪纲，用心至为深远。”

《容台文集·卷五·论》中，有一篇《爱惜人才为社稷计》（丁酉江西程），其中阐述江山社稷应该以重视人才为本务，实在是一腔热血；在《木晦于根》一文中，有“君子之养德，也宜何如哉？观天之道，而执其机焉，如是而已矣”。则在表明，对于士人来说，面对“有道”之天下的态度，甚至，在暗示“君子”之于“无道”时之所以“韬光养晦”的理由。

如此来看，董其昌分明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对“天下”有着理性而深沉的思考。

只可惜，董其昌的很多建议并未得到朝廷重视。到明朝灭亡后，因为鉴于董其昌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观点触及清统治者的痛处，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容台集》遭禁。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评文》中有一段话：

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担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观莲，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挂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何论雕虫末技。¹

呜呼，董其昌何等心怀？

以禅悦的真切体悟，鄙夷那些为现实利益而苟且行世之人，认为若要做个“出头人”，必须做到且放身心，洒落虚极，纵使以“雕虫末技”托身，最终也会“大有入处”，此不谓儒家经世治国之本？岂不是“担当宇宙”之人？

且看，他还有慨叹：

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

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

然而，在政治方面，董其昌深刻意识到“图报无望”这一点。

毕竟，在陶党集团气焰嚣张的世道之下，公德沦丧，人心败坏，什么理想抱负，什么政治主张等等，都难以施展。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言行十分谨慎，不敢正常参与政事，唯恐受到牵连，性命不保。

分析董其昌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五朝。

，而在他入仕做官时，已经是万历十七年（1589）。此时，正是万历帝长期“怠政”时期，也是他和臣子们发生激烈争执和冲突的“国本之争”阶段。继而，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政局越来越坏，各种矛盾愈演愈烈。

此后，天启年间，则状况更糟，魏忠贤已完全左右了年轻的熹宗皇帝，陶党专政局面形成，甚至出现在朝的士人们之间意气用事、肆意诋毁的现象，而坚持道义的一些士人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么革职，要么丢命。

据《明史》记载：“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明史》卷242“赞曰”）于是，群臣“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弭谐无闻，循默避事”（《明史》卷218“赞曰”）。的确，政治方面的高压政策，对文人士大夫的心态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和影响，以至于，多数内阁大臣不得不采取明哲保身的处事策略，尽量保持沉默，既要迎合皇帝，又要不得罪他人。

“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在对待“仕”与“隐”的问题上，与所有士人心理一样，董其昌也颇为纠结和苦闷。但是，没办法，他只有不断地退回到江南，退回到他的温柔乡里。

不废职务，不停薪水，而能长期闲居在家，赋赋诗词，弄弄笔墨，偶尔与二三好友外出仙游一遭，“仕”乎？“隐”乎？

当然，董其昌希望自己在政治与艺术两方面获得“双丰收”，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与前代乃至历史上有相同经历的先贤作比较。他在晚年对自己的“收获”颇为得意：《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

在本朝余与鼎足。若宋迪、赵孟頫，则宰相中煊赫有名者。”而且，他也明白，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者，只有赵孟頫一人而已。然而，若论官阶，他最终稍高于赵孟頫；若论书画艺术，他的名气与影响力也比赵孟頫更有引人注目之处。

事实上，董其昌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一种人格分裂的存在。他的内心充满冲突，既倾向于成为啸傲山林的隐士（至少像陈继儒一般），但同时又企望儒家文化的秩序和规范，内心深处存在着不可能彻底反叛传统的矛盾和犹豫不决。

可以说，他拥有一个狭窄的个人化空间，既密闭，也敞开；既沉默，也躁动。这些因素在孤独与虚荣的巨大落差中此起彼伏，在抵牾的冲突与退隐的协调中左右摇摆。

从客观上来讲，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导致了朝野上下混乱、攻讦与鄙陋的滋生，是那个时代纵容了私欲与杂质的膨胀。以至于，在“画坛宗师”与“道德失节”之间，在艺术上的“牵强附会”抑或“别具只眼”之间，在世俗世界的“批判”与“宽容”之间，人们似乎将董其昌视为一个“特殊存在”。

时至今日，我们对董其昌的评价也是“矛盾重重”，甚至具有“分裂性”特征，诚如董其昌的“矛盾重重”与其“分裂性”特征一样。

二、改变董其昌一生的几次关键事件

于此，回顾董其昌一生中的几次关键事件，不难发现在其“政治”与“艺术”两种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内在超越所在。

事件一：府试受挫，发愤临池（1571年）

董其昌自称“十七岁学书”。²其所称的“十七岁”那一年，即1571年（隆庆五年），当时董其昌参加府学考试，“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主考官认为他文采还算不错，但字写得太不足，就把他降为第二。这令董其昌颇伤自尊，从此发愤临池。

事件二：与李贽的一面之缘（1598年）

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他与李贽有过一面之缘。《画禅室随笔》卷四记载：“李卓吾与余，以戊戌春初一见于都门外兰若中。略披数语，即许可莫逆。以为眼前诸子惟君具正知见，某某皆不尔也。余至今愧其意云。”可以说，李氏狂狷傲世的气度与直指人心的洞见无疑给了董其昌一次强烈刺激。

事件三：“坐失执政意”（1598年）

仍是1598年，冬，董其昌在皇长子讲官任上寄予政治梦想的时候，却因过于用心，加上“因事启沃”皇长子的某些言辞，引起皇帝不满，被调离“讲官”一职，因而“坐失执政意”。在被授予湖广按察副使这样一个看似升迁、实则外放的四品官职时，董其昌则认为这是皇帝打发他离开京城，自然心灰意冷，遂以称病方式未予赴任，呈请保持翰林编修之职回乡休养。

事件四：考场风波（1606年）

1605年，一直回乡闲居的董其昌深感到被召升任的机会渺茫，勉强接受了湖广提学副使一职。次年，他出任地方考官，因不接受考生行贿，反被势家捣毁公署。后来，他自己也曾记述：“及余行部，以法裁诸贵人。楚善怨，又有耽耽者。”《明史》也曾记载：“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随后，董其昌不顾皇上挽留，执意辞官还乡。

事件五：“民抄董宦”（1616年）

前文已有述及，于此简要记述。

1616年，由于董其昌及其家人行为不当，与当地士人发生冲突，在华亭镇引发骚乱，士人与民众数百人焚抢董宅，致使董其昌一家四处逃难。是所谓“民抄董宦”事件。

综上所述，试做分析：

因为“事件一”，董其昌经过勤奋与积淀，练就了他在书法上的扎实功底，这不仅成为他最终获得功名的关键，同时也为自己的绘画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

因为“事件二”，董其昌似乎意识到“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之间的巨大落差。当然，这“落差”更大地来自于心理之上。无疑，董其昌要拿自己比照李贽，是沉溺于浑浑噩噩的世俗世界，还是做超然物外的“无冕之王”？哪一个更符合心性与直觉？哪一个更符合“绝假存真”的个体本真感受与真实愿望？

因为“事件三”，董其昌一直在寻找升迁的机会，希望通过努力实现对于更高权位的获得，但机会始终阴差阳错。本来入仕之后一直青云直上，而能够升任皇长子讲官的高位，让董其昌对于腾达有了更高的幻想。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忽然间，所有优势，转瞬即逝。无疑，董其昌经历的这次“失意”，在其从政以来前所未有，受到的心理打击巨大。一时间，董其昌难以平衡失落的心态，以至于，皇帝另封给他外省官职，他也毫无心情赴任。并且，他似乎看清了官场的险恶，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政治理想的遥遥无期。于是，在1599—1622年（45岁至68岁）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一方面保持着官员身份，另一方面在松江、苏州一带过得悠然闲适的生活，在诗酒与翰墨之间寻找失落却也真实的自己。

因为“事件四”，本来上任湖南就不太情愿，秉公办事又招来嫉恨和攻击，考场风波也令董其昌深受刺激，他进一步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认识到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之路。

因为“事件五”，1616年的“民抄董宦”事件，确实给董其昌造成了心理上的强烈震撼。以至于，他一直耿耿于怀。同年八月，他还在一段题跋中聊表不平之气：

今日偶读山谷老人题跋，随意书数则。其雅挹东坡，千古交谊可想。李伯时、米元章皆叛公于追论元祐党籍之日，当时物论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世人以须臾富贵而卖友排贤，至有助之羽翅而反戈相向者，其于忠孝大节何有也！丙辰二月之望偶笔书此，一似诗识。是年八月二十日重题志慨。³

以黄庭坚的经历，映射自己心中之怨。

由此可见，家宅焚洗之惨烈，惨淡漂泊之凄苦，万感交集之无奈，无不是灼痛董其昌内心的不灭之火。或许，这一刻，他又能回忆起与李卓吾“见于都门外兰若中”的一幕，心里或许更为倾向于野鹤闲云一般陪他一起游山玩水的陈继儒吧。

如果说“坐失执政意”让董其昌的权位梦想遭受了沉重一击的话，“考场风波”则促动了他自己之于权势与艺术的重新定位，而“民抄董宦”事件则令他彻底认识到对于权位的“热情”必须迅速冷却下来，而对艺术则应该越来越寄予更为高远的臆想与期待。由此，董其昌最终“实现了由政治到艺术的人生转向，实现了人格原形的内在转换”。⁴

老子讲“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

又讲“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

显然，董其昌也于此间不无理解。对他而言，政治上无能为力，在艺术上却是可以说了算的，完全可以在艺术世界里另立王国，他完全是这个世界里的“无冕之王”。

可以说，董其昌一生穿梭于仕林，不过是苟且偷生而已。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没有“忧患意识”，而恰恰相反，他丰富的内在期求，也决定了他将寄希望于通过“艺术”这道门径，从现实的无限失落走向精神世界的超越与升华，来完成他“担当宇宙”的信心与责任，来完成他对世俗世界的深重慨叹与无奈的一种自我救赎。

说到底，董其昌无非一位凡夫俗子，他在世俗层面上确实不尽如人意，这一点必须予以唾弃和批判。但是，不能就此一点完全否定了他在艺术领域的突出贡献，他是有识见的，是有担当的，他的审美理想无疑是一朵莲花。

注释：

- [1]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
- [2] [明]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七一。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75页。
- [3] 参见王永顺主编《董其昌史料·黑白小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 [4] 樊波《董其昌》，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7页。

此身未幾

何日杜宇花

二語題於此南

主筆之是也

眉公



飯香家如苑

溪山亭子圖

主筆



Contents 目录

导 言

仕途人生

生于乙卯

屡试不第

终就功名

宦路沉浮

晚节有损

得封高位

行迹与交游

董其昌行迹

董其昌交游

美学思想及其理论

美学思想探源

“以禅入书画”的背景与理念

书学旨趣与品评概念

关于“南北宗论”

关于“文人之画”

理论建构及争议分析

绘画艺术

习画经历与鉴藏之功

董其昌推崇与比照的画家

董其昌山水特色

董其昌绘画影响

论画类编

历代评论摘录

董其昌年表

董其昌用印

主要参考文献

108

120

127

175

175

181

201

202

211

249

290

298

301

1

1

1

3

4

11

19

57

57

68

85

85

94

104

仕途人生

生于乙卯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又号思白、思翁，1555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生，松江（今属上海）人。其祖父董悌，父董汉儒，母沈氏。

董家先祖原籍河南开封，后随着宋高宗南渡而占籍松江。据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传》记载：“余家厥初为汴人，自扈宋南迁，更居华亭。”至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中进士后，又由松江府上海县占籍同府华亭县（《春申旧闻》卷一四）。

董其昌出生那一年，在大明的版图上，正危机四伏。不仅“倭寇”猖獗于浙江、江苏、山东等地，而且陕西和山西等地还曾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死亡80余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大地震。天灾与人祸，似乎预示着晚明政权摇摇欲坠。

董其昌祖上虽是官僚出身，但到了他父辈时期，家道已经败落。父亲屡试不第，最终只考取了秀才。《白石山樵真稿》曾记载董其昌“家甚贫，至典衣质产以售名迹”为生。《云间杂识》也曾记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可想而知，光靠一点贫瘠的家田维系家庭生活，实在艰难。

屡试不第

对于董其昌来说，要想摆脱困境，出人头地，中兴家业，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做官，走科举仕途的道路。

董其昌一生踌躇满志，但最初他的功名之心连连受挫。

1571年（隆庆五年），董其昌17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试于邑”，因考官松江知府衷贞吉以其“书拙”被“置第二”（据《画禅室随笔》卷一）。他因此大受触动，立志发愤临池。

1572年（隆庆六年），董其昌从学于莫中江等，得益不少。据《容台文集》卷二《戏鸿堂稿自序》载，自“仆与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从曩时读书莫中江先生家塾”，“至岁丙戌”，已然“荏苒十五年”，推算一下，“丙戌”以前15年即隆庆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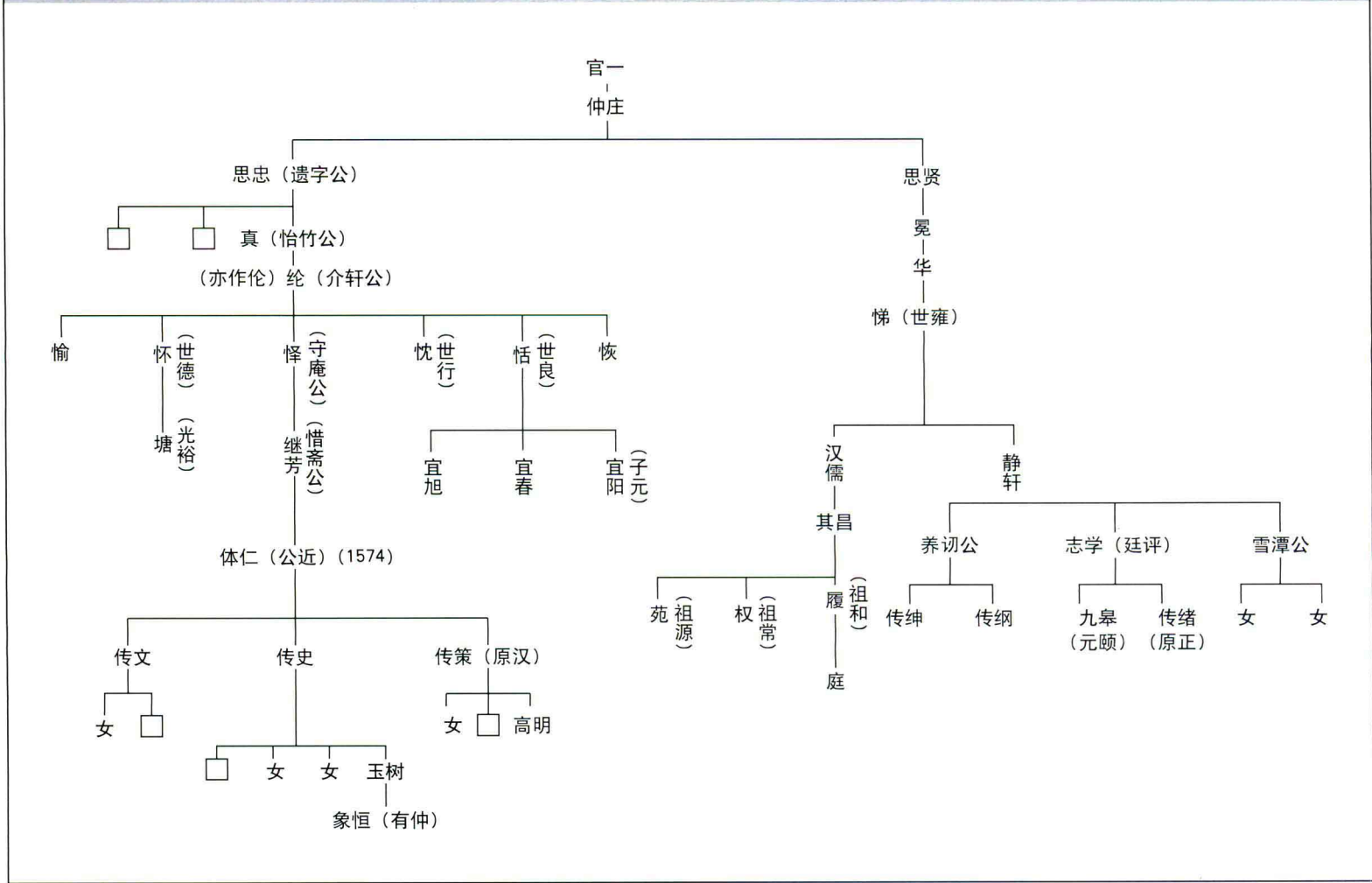
1577年，董其昌曾拜陆树声（1509—1605）为师。此年四月一日，他第一次挥毫染翰。顾麟士《过云楼续书画记》卷三识曰：“予学画自丁丑四月朔日，馆于陆宗伯文定公之家，偶一得之。”

1579年（万历七年）秋，赴南京参加乡试，未第。此次出行，却得见王羲之《官奴帖》唐摹本，惊叹不已。

这一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1543—1607）来到中国，他所携的物品中

董其昌家谱简表

此表根据郑威编著《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9 年版）第一部分“董氏的世系”编排而成。



有“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罗明坚也由此成为有记载以来把油画带进中国的第一人。此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乔瓦尼也于1581年、1582年先后到达中国。他们在澳门等地传教的同时，也将西画在中国得以持续性传播。

1585年（万历十三年），董其昌再赴南京参加乡试，再次名落孙山。

这个阶段，董其昌基本上生活在平湖一带，一边继续攻读，苦练书法，一边靠当私塾教师糊口。因为教书收入甚微，他不得不也张罗着卖些书法，只不过生意寥寥。《当湖外志》卷一：“董文敏未第时，曾馆于我湖冯氏。家贫，服白布单袍，兴

至即书其上，久乃尽墨之。屏帟床帐，淋漓殆遍。既贵，始见珍。”另外，他还爱好参禅曹洞宗，不肯依傍他人门户。并且，追摹陶渊明、白居易遗风，与友人结成“陶白斋”文社，经常聚在一起，少年意气，欢饮狂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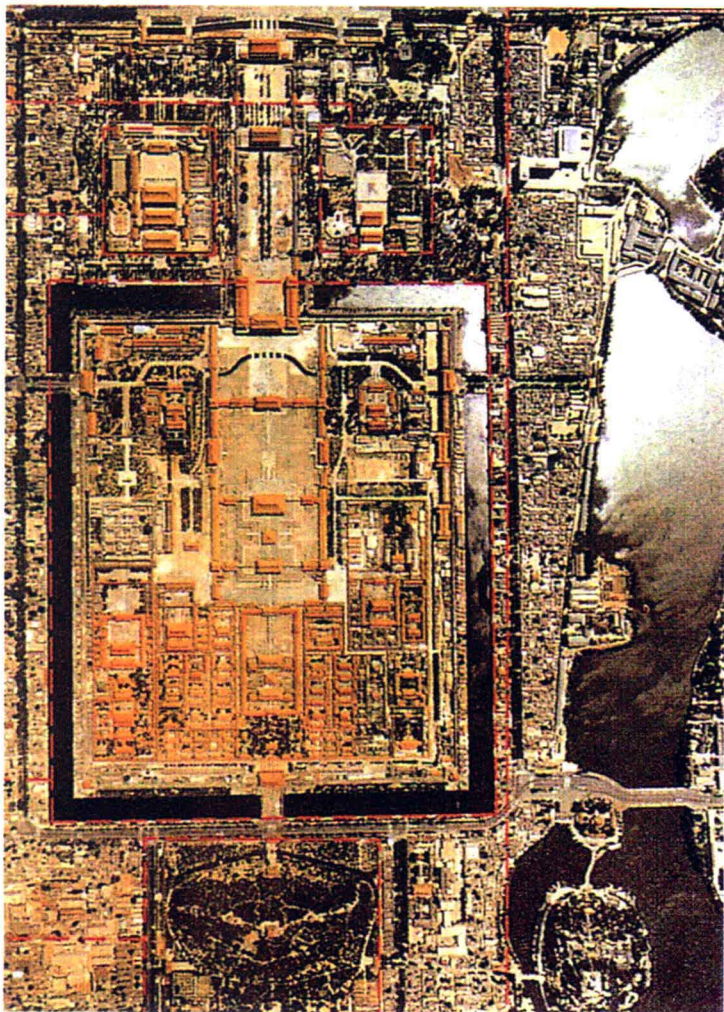
终就功名

直到1588年（万历十六年）秋，董其昌三赴南京参加乡试，终于考中，并名列南直隶省试中第三，其诗卷上所显示出的文采还受到王世贞称赞。

1589年（万历十七年），中举进士，在会试中名列第二，在决定最后名次的廷试（即殿试）中名列第四，为第二甲第一名。

这一年，董其昌35岁。随后，他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亦称“庶常”）。翰林院为朝廷储才之地，是通往中央政府要职的“生产车间”。而能够有机会亲近皇帝的官员，则要参加定期举行的经筵活动，而“经筵”中的官员则多由翰林院中尤其是庶吉士中升补。士子们只有考取进士才有机会被挑选（称“馆选”）为庶吉士，此后进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散馆才有资格被任命为翰林院官员。

董其昌就是当时进士阶层347个名额中被选中的22位庶吉士之一，得以入翰林院学习。从此，他开始了几十年“春风得意”的仕途生涯。据记载，他为官约45年左右，先后奉命过三个皇帝。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皇长子讲官、湖广副使、湖广学政、太常卿、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



（明）故宫紫禁城平面图

1406年（永乐四年），明成祖朱棣下令，仿照南京皇宫大规模营造北京宫殿。1420年建成。次年，迁都北京。



职。当然，这些踏遍青云的官职，更有赖于他对政治的异常敏感。在阉党乱政的时局中，他像一条熟谙政治风向标的变色龙，稍有风吹草动，便托病回避，甚至请求辞官返乡。

董其昌的理想，就是希望通过仕途改变人生。

能够既做高官又富享画名，是董其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全息图像里最大的“成功”。他曾三次列举这种类型的历史人物，主要集于唐、宋、元三朝，人数确实很少。他把高克恭、赵孟頫等始终作为自己的参照系，一生希望在艺术与仕途两方面同时有所超越。

所以，董其昌一方面结交名流要职，周旋于官场；另一方面则勤于笔墨实践，书画并举。在与同僚们交往中，他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名帖宝绘，有的能够借来，则仿鉴临摹，废寝忘食，这大大有助于他的书画技艺和鉴赏水平的提高；同时，他又充分利用已然获得的书画实力与名气，周旋于官宦显贵之间，官职也因而不断得到提升。

宦路沉浮

1591年（万历十九年），掌管翰林院事的礼部左侍郎的田一俊因病去世，田一生清廉，身后萧条，素为馆内人所敬重。身为翰林院庶吉士的董其昌则主动请缨，自愿护送老师田一俊灵柩南下福建大田县老家。这件事足见董其昌恭谦的一面，而这次长途跋涉也使他大开眼界，见到了许多名胜古迹，返回江南途中，还用心搜集元季诸家的墨迹。外出近一年，董其昌回到京城，然而他错过了庶吉士结业考试，其他同道都被列为编修或检讨，他则失去了这次晋升的机会。直到1593年5月，董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任职六年之久。《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记载：“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还，授编修。”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董其昌任“经筵”展书官，并受命参与编纂《国朝正史》，并出任皇长子朱常洛讲官。《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皇长子出阁。充

（明）世宗朱厚熜像（左）

董其昌生于朱厚熜在位期间（1521—1566）的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

（明）神宗朱翊钧像（中）

朱翊钧于1572年（隆庆六年）即位，当时他年仅10岁。次年改元万历。1572—1620年间，他在位48年，在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

（明）光宗朱常洛像（右）

明光宗朱常洛（1582—1620），因服“红丸”驾崩，仅在位一个月，年号泰昌。1594年，董其昌曾受命充任朱常洛讲官。但后来因讲了违背皇室意愿的话，被调任离京，董其昌加官进爵的梦想遭受重大打击。1620年，朱常洛即位，念及旧讲官董其昌，下旨召为太常少卿。然光宗遽然去世，66岁的董其昌未及领旨。



青绿山水
绢本 设色
117cm×46cm
1607 年作
故宫博物院藏



高逸图
 纸本 墨笔
 98.5cm×52cm
 1617 年作
 故宫博物院藏